
黃秋香女士訪問紀錄¹

訪問：張宗坤²、陳柏謙³、史學敏⁴

陪同：羅世皓⁵、吳柏蒼⁶

紀錄：張宗坤、史學敏

時間：

(一) 2020年5月14日上午9時至12時

(二) 2020年5月21日下午2時至4時

(三) 2021年3月4日上午11時至12時

(四) 2021年4月23日上午9時半至12時

(五) 2021年5月3日下午2時半至3時

地點：新竹黃秋香住處(新竹湖口)、勞動黨桃竹苗勞工
服務中心(新竹湖口)

1 訪談者按：訪談者要特別感謝羅美文先生的引介，以及史學敏在整理稿件方面的協力。黃秋香女士並向訪談者分享了她所保存的大量工運史料，我們亦要向其努力致敬、申謝。本項訪談獲得文化部「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補助—戰後台灣客家工人的勞動經驗與族群文化：以遠東化纖新埔廠為例」支持。

2 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

3 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秘書長

4 夏潮聯合會執行秘書

5 新竹縣羅美文議員辦公室助理

6 新竹縣羅美文議員辦公室助理

受訪者簡介：黃秋香女士，1960年出生於新竹新埔。1978年至亞東化纖（遠東紡織化纖廠前身）服務，1986年成為遠東紡織新埔廠工會會員代表，與丈夫羅美文一同投身解嚴前後的勞工運動，出力甚多、無役不與。1989年遠化罷工敗陣後，又以該工會常務理事身份擔起重建重責，後再於台灣省人造纖維業產業工會聯合會、新竹縣總工會擔任理事等職務。是次訪談請黃秋香女士從女性觀點看待工會、工會幹部和工運，分享投身勞動和罷工中的女性所獨有的眼界。

一、新埔山間的採茶姑娘

我是1960年出生的，要幫我過生日的話，記住兒童節就是了。我們家兄弟姐妹有9個人，其中我最小，跟大哥差20歲，跟姪兒差4歲。

我住新埔，可是是在新埔山上的太平窩，我們家的茶園跟湖口是連接的，那裡以前是陸軍用地，我就在那裡出生長大，老一輩好像也就在那裡。我們不算承租，也不用給他們錢，產權還是屬於軍方的，我們不能處分那些地。他們可能認為我們在那裡居住久了，就一直讓我們住在那裡，這幾年不給再蓋，但是我們住的他就不會收回。從去年（按：指2019年）開始，軍方說要把土地徵收回去，再給我們地上物的補償，也經常會去巡。

我們家有種柑橘、水梨，還有水稻跟茶園。爸爸在新埔街上做國術館，家裡的工作就是我們做。我還要跟人家換工，採茶會採到湖口的糞箕窩。我父親主要的工作是接骨師，我跟哥哥、嫂嫂還有媽媽要負責全部的農務。接骨是從我爸爸開始的，應該是

自學的，他的國術館在鎮上算是大有名氣，我哥哥後來也接手做。

因為我最小，哥哥姊姊都外出了，家裡只剩大哥、大嫂還有我爸媽，茶園的事變成我跟大哥、大嫂負擔。在這之前，茶園的事都是哥哥姊姊在做，搬出去的就沒有幫忙。大哥大嫂負責田的事，我就負責在暑假跟鄰居去採茶。小學開始，冬天稻子收割完了，留下的梗我們要光著腳踩到田底下去。以前沒有耕耘機，田裡有很多水蛭，被咬到腳都痛死了。我們家後面還有養牛，豬、雞、鴨、鵝也都有。那時家裡種稻米是自己吃，養豬好像是收入來源之一，種茶葉、洋菇這些也都是收入。茶葉賣的價錢很便宜，種的水果是自己吃的。

我們採茶還是用手剪，茶剪上有一個袋子，手經常剪到沒辦法拿筷子。到了山上，公車站就在我們對面，不用戴手錶，只要看到車班上去，我們大概就知道幾點鐘。有時下雨，才不用去採茶，但其他時間就跑不了了。大哥跟大嫂後來也都搬出去外住了，老房子雖然還在，但我也只有假日的時候才會去那裡看看。人到老了，會循著之前的土地走。稻田早就沒了，茶園變成竹園，有些就是荒廢。

我們家應該是那個地方第一個有電視的，在我小學之前就買了，當時聚集好多孩子看摔跤跟打棒球。我們家跟其他那邊的人來比算是小康，所以比較有助人的個性。住在上面的一個鄰居非常窮、孩子又多，窮到住茅草屋，燒飯燒到鍋爐黑黑的。他們其中一個女兒嫁過來現在湖口這邊，我跟他老公說「你太太之前是我們鄰居」，他就說「我知道、我知道」，他老婆有說過，以前我們這個家庭非常照顧她們家。

我讀北平國小，⁷ 國中在新埔國中讀書。現在學校雖然還在，但面臨廢校，人都已經搬出去，會在那裡住的基本就是外配的小孩。後來住在學校附近的剩下我跟我哥哥，我三哥還住在學校附近，學生裡他家孫子就佔了很多，平均每班八人，有些班一、兩人。更早幾年，我鄰居問了讀北平的姪兒說他考試考怎樣，我姪兒說他考了第五名，叔叔就稱讚說，「考得這麼厲害喔，那叔叔買禮物給你。」後來他再問，「你們班幾個人？」我姪兒說六個人，叔叔就要他把禮物還來，哈哈！

我是北平國小的第三屆，那時每一班都還有 40 幾人，一個年級一個班，我們班就 43 個人。建那間學校，當地人出了非常多力，我們家的人丁非常足夠，有些人挑木頭、挖泥土去興建教室，所以佔了很大的一份。這間國小離我們家不遠，我們家其他兄弟姊妹都去新埔國小，只有我讀這間學校。從我家走去新埔國小要一個半小時的路程，哥哥姊姊他們還要順便挑豬菜去市場賣；但我走到北平國小就只要 15 分鐘。可能因為住在鄉下，那個年代大家感情很好，想法也非常純真，跟老師或同學的互動都特別好。但不管是小學、國中到高中，我都沒有因為老師影響到之後的事情。

讀新埔國中時，我是搭公車去的。高中念的是中壢的育達，我爸在新埔租了小小一間房子，就是跟我爸一起住，禮拜五晚上回來太平窩，禮拜天傍晚又回到新埔，第二天再去上課。從新埔還要搭公車搭很久到中壢去，經過內思工商、龍潭，到中壢火車

7 北平國小成立於 1967 年，按此推算，黃秋香為 1969 年入學。請見何明星總編輯。2014。《新埔鎮誌》增修一版。新竹：新竹縣新埔鎮公所，頁 232-233。

站，然後再由校車接駁到育達。街上有車到中壢，所以比起從老家到學校更方便。

我認為自己算是姊妹當中最幸福的。父母沒有要我繼續升學或就不要念了，就我自己，可是我又不是很會唸書。我在高商念的是打算盤的商科，沒有興趣，就是混一個文憑。我真正比較有興趣的其實是護士學校，要是當了護士，得懂很多英文的專業名詞，可惜我英文不好。國中的時候其實就有教英文了，可能是我資質很差，國中又要做家事，所以學得沒有很好。會很想當護士，是因為我有愛心跟耐心，可是沒辦法。

二、進入遠東廠⁸

其他的兄弟姊妹後來都到新竹以北工作。小哥先當了會計師，在台北工作；姊姊腦袋也很靈光，雖然學歷並不高，她也是做這樣的工作。我一度想要離開家，雖然沒有特別喜歡都市，還是喜歡鄉下，但就是想離開農事。67 年（1978）高職一畢業，我到台北一個月，但又被叫回來，然後在同一年進去遠化。⁹

8 受訪者所稱之「遠化」、「遠東廠」，全稱為「遠東紡織新埔化學纖維總廠」，現稱為「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」。其前身為 1969 年成立之亞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，意思為亞洲水泥與遠東紡織共同成立之紡織公司；該公司後於 1979 年併入遠東紡織公司，故更名為其下之新埔化纖總廠。

9 經查國史館勞工陣線聯盟全宗史料中之「1988 年遠化工會五一紀念品發放名冊」，黃秋香係於 1978 年 9 月 4 日入廠，在絲物理檢驗科服務。見〈遠東化纖罷工事件（一）〉。《勞工陣線聯盟》。國史館藏，入藏登錄號：122-040000-0002。

我去台北是爲了找姊姊，也是想出去逛逛。去台北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難得，畢竟從鄉下來，會好想去百貨公司、好想去逛街。可能去的時候是夏天吧，我很不喜歡那時候的台北。我姊姊一個嬌滴滴的朋友來找我時，一把傘撐著邊喊「好熱喔」，我卻想「哪會熱」。台北的空氣不好，一出來大家就開冷氣，走在騎樓下還有熱氣衝到我們。都市的交通也讓我很不喜歡，雖然工作做得辛苦，又不想要做農事，但到現在還是習慣住鄉下。

進去遠化之前，只有高中時坐公車從那裡經過。在那裡上班的人其實是很風光的，可是我只覺得工廠的鍋爐廢氣很臭，甚至說，「以後絕對不要進這間工廠工作！」就算不是天天聞，也真的是太臭了。進去後好像會越聞越習慣，雖然還是很臭，但是不會像剛進去的時候那樣。

遠化離我家不遠，它也是附近最大的廠。不是我自己想去，父親、是母親要我進去那邊工作，當時好像沒有自主權。我們家可能太鄉下了，比較會聽父母的話，環境也不會讓你覺得一定要再求學。鄉下長大的孩子，都是父母講要怎麼做就怎麼做。雖然對進遠化有些抵抗，但沒辦法，還是要聽父母的安排。我爸當時在新埔街上小有名氣，進去的時候只要面試，總之也是透過關係。兄姊們也是比較聽話，不像現在的孩子，可能那個年代也比較不敢叛逆。雖然像大哥最後還是離開了鄉下，但他是留最久的。

新埔除了遠化外，當時還有遠東製衣、¹⁰大同磁器，¹¹遠化附近還有一間日立電子廠，我三姊姊在那裡做過。我有些國中的男同學也在遠化，平常沒有聯絡，不是我們約好去那裡工作，是進去才知道他們在這裡。國小的同學，倒是沒有。男生比較可能留在當地工作，女孩子則是嫁到外地。高中的同學我比較沒有聯繫，也不太清楚他們去哪裡工作，而且女孩子結了婚，可能都在家裡，聯繫也都會變少。

我對制度不會很順從，比如說高中時期發生燒中壢派出所的事件，當時覺得很正義。進入工廠我也特別有想法。在單位輪班時有個值班主管，他非常搞怪、要求表現，就會限制這個、限制那個。這很不合理，我會想聯合其他的人，推翻這個制度。我跟人家的好不一定如膠如漆，理念比較一樣的，感情也比較好。大家的感情那時候比較會融合在一起，還都會配合，不像現在就是自掃門前雪。

10 遠東製衣廠，與新埔化纖總廠同屬遠東集團紡織事業部，主營成衣製造業，和遠東紡織並不互相隸屬。該公司內曾有新埔遠東製衣廠工會，係於1988年遠東製衣廠女工爲爭取生育補助自行發起，並由遠化工會的羅美文、陳金進協助成立。該工會以其理監事均爲女性而聞名於工運界。見彭桂枝。2004。〈女人與工作：一群客家農村中年女工的工作經驗〉。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），頁110。

11 大同磁器公司，係由曾從事日本瓷器進口的廖長庚於1960年創辦。第一廠區設於淡水竹圍，在生產技術上獲得日本三鄉陶器株式會社協助，於1963年產出第一批國人自製的磁器。新埔廠區係於1976年設立於新埔南平里。請參考大同磁器公司。年代不明。〈關於大同〉。大同磁器公司（url=http://www.tatungchinaware.com.tw/About.aspx），檢閱時間：2021/03/04；何明星總編輯。2014。《新埔鎮誌》增修一版。新竹：新竹縣新埔鎮公所，頁161。

早期的工廠假日或小 off 我們會出去玩，那個年代是抽鑰匙、坐摩托車出去玩，抽鑰匙大部分是跟新埔這邊不同單位的人抽鑰匙，長纖單位、短纖單位這樣抽，有時候也有同事會邀外廠的朋友來，但還是同廠的比較多。因為是騎摩托車，去的地方還是桃竹苗一帶比較多，比如說去關西的蝙蝠洞，或是去大湖採草莓。那時候也流行看電影，同班的也會在小 off 出去，到新竹市看看電影。我算是很少去電影院看電影了，偶爾去一下而已，去新竹市的話多半是去逛街。工廠裡面早期比較多人打籃球，雖然遠化這邊沒有真正可以比賽的隊伍，但還是有籃球比賽，通常是叫紗廠的一起來。這些到後來就沒有了，只剩路跑之類。

三、情竇初開到婚後的「第二輪班」

跟現在來比，早期同事間的相處比較好一點，想到那時候大家的感情，我好回味。罷工之後，有些主管甚至會說「現在的工人沒有早期的那種感情」。雖然工作當中，大家會覺得哪個人工作做得怎麼樣、怎麼樣，但畢竟不像現在這樣競爭得很激烈，好像工人在鬥自己，勞勞相爭。

到了 80 年代末期，公司採用考績制度，比如說錠子掉了會扣錢，這是大家非常計較的事情。工廠自己做一個制度出來，讓工人內鬥，反正這一定會有第一名、最後一名，爲了爭第一、讓考績好的獎金多些，萬一有升遷機會也比較有可能，工廠有這些制度，讓你們自己去拼，大家的感情就會產生不良的變化。早期產線上人員的想法都比較單純，不只是我們班的感情很好；但現

在進入職場的人很不一樣，上班就是各過各的，比較個人。

羅美文一開始就在假撚廠，他聽樓上包裝課的同事講，樓下來了一個新人，好像很開朗，他就下來看。他是機台保養員，負責修機台這些工作。有一次在蒸飯的時候他說，「我覺得你不錯，很適合我家。」他大概覺得我很開朗吧。

那時候哪有什麼交往不交往？我們是到認識半年以後才比較有講話。他是「隨班保養」，個性是很雞婆型的。應該是 68 年（1979）的時候，平時要去上班，我沒有摩托車，所以要先搭公車，到宿舍睡覺，再輪夜班。他會在北平國小那邊等我，拿著書在那邊看，我從山上看下去，稍微可以看得到。到了公車差不多快來的時候，我背對著不讓他看到，趕快搭上車。他是很粗枝大葉的人，很多次都沒有發現。這樣做是因為我會怕，主要可能跟家庭教育有關：我不能交男朋友，不然會被打死。

我們第一次出去已經是半年後的事。不是兩個人喔，還是整個班的活動才敢。這之前從來沒有給他載過，不敢單獨一個人。單獨出去，只有像小 off 那樣時間比較多的時候，就和他跟他另一個同學去看電影。他的執著是很驚人的，比如說後面從事工運，他覺得對的事情、他要做的，阻止好像也沒什麼用。我是鄉下的孩子，對於愛情，或是喜不喜歡這個人沒什麼想法。後來看他都一直在幫助別人，我覺得應該比較可靠吧。

在假撚廠生產線上值班的都是女性，男性就是主管跟保全。廠內還有筒子機，假撚撚過的紗會再過去筒子，到後面又引進高速假撚機。我們一個班大概十幾個人，一個人要看一到兩台。跟在家裡相比，工廠的作息很不一樣。假如假撚機走得很順，心情會好一點；但只要錠子飛掉，其他工作好像也沒什麼心情再做，

你就深怕那錠子找不到。而且，運轉中的機器捲到紗，會越捲越多、越纏越大。結了「苞子」的話，不只要扣錢，整台機台還有可能全都停掉，那損失就會比較大，所以每個人都會很怕。錠子就小小一根，只有筆尖那麼大。如果絲斷了，糾纏在錠子裡頭，錠子就會飛掉，甚至掉入黑漆漆的地下室，得要摸黑下去找。

剛進去的時候（訪談者按：指民國 67 年，即 1978 年），我的薪水應該是 5,000 元左右，那時候已經覺得扣錢的制度不合理了。一支找不回來，扣 50 元也就算了，還特別難找。我沒有統計一個月都被扣多少，基本上大家死命都會找回來。但還是有找都找不回來的，因為有廢絲在那邊，捲在哪邊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每一把絲我們都會拿來捏一捏。同事之間也會互相幫忙，像有人掉針，我們看的機台要是順，也會跑過去幫忙他們找。

羅美文經常幹這種事，他非常賣力、很認真地摸黑到空調室去找。他是保全，這不是他的責任。他也不只為我幹這種事，而是為每一個值俾人員。那時候的保全比較接近維修人員，跟現在所謂的保全完全不一樣。沒事的時候就在保全室裡頭，我們值俾的人有問題才會去叫他，但他對於這種事情卻是非常熱衷的。看他這麼做，我只是覺得很熱心，對於對的事情很執著。我還想說，人家對我那麼好，不要辜負人家，但也就這樣子，完全沒有其他的概念。他是完全不修邊幅的人，經常是人家都打卡下班了，才匆忙走進來打上班的卡。每次他都穿著汗衫，然後又頭髮長長、鬍子長長，我媽就說，「你要嫁一個比你爸還老的啊！」

結婚沒有很久，我媽就得了子宮頸癌。羅美文應該清楚我媽不能堅持很久，每次都會載我回去。他比我還捨得，雖然薪水也不是很高，而且那時候我們有小孩了，他還是很大方地出手 5、

6,000 塊都非常捨得。他經常回去看我媽，我媽就講說，羅美文比她之前看得還好，這是我媽親自告訴我的。

羅美文真的是很努力追求我，這個主調是沒有錯的。我爸可能認為他女兒的條件應該比男方好吧，雖然我書唸不高，也沒交過男朋友。以前採茶時，我們很多年輕人不是沒有碰過面、也知道誰是誰，但是完全沒有談戀愛或產生了什麼感情。那都是父母彼此覺得，比如說我會採茶、很乖，是不是可以給他做媳婦，可是年輕人沒有這樣的想法。我沒有交過男朋友，是後來才發現愛情不能跟別的情感等同。也許我們是鄉下長大的孩子，腦袋裡都是家庭父母給我們的觀念，很單純，就覺得他對大家都很好，比較可以依靠。

我們這邊的羅家特別大男人主義。嫁過來的時候是住在三合院，這裏住了祖母、兩個伯伯、一個叔叔跟我們家。當時我們女孩子非常辛苦，下班回來除了養雞、養豬之外就是顧孩子，然後煮飯。煮完飯了，一定是男人上桌吃，家裡雖然沒有強調女性不能馬上吃飯，可是我們家女孩子的地位就是這樣，是最慢去吃飯的人，家族裡其他女性都是這樣，我們也不敢。我嫂嫂也在附近的電工工廠上班，但是回家就還要負擔這些。我其實很想立刻去吃飯，吃完再一起做，不要拖這個、拖那個。我們上班都累得要死，吃完後還要收拾、洗衣服，時間就拖得很長很晚，等去吃飯的時候都只剩下一些菜尾、菜湯，就是這樣吃一吃。

我們結婚的經費是標了兩個互助會來的，標到就先用在我們的婚禮，再用結婚後的薪水還了一些。後來小孩子教育的錢都是一起出的，但是顧小孩、帶小孩還是靠我。那時候紙尿布少又貴，根本負擔不起，只有很少的時候在晚上時用。我們還會把喪

家的白布剪一剪來當成尿布，那真的是很環保，去河邊洗一洗，婆婆白天拿去曬，就可以重複使用。上班的時候再把尿布帶去工廠，放在鍋爐那邊，下班帶回來就又可以使用。

四、初識工會，團結女工

我開始接觸工會，應該是從結婚之後開始，雖然剛開始不是這麼積極，只是擔任會員代表。那時候工會很熱門，很多人都會到工會去，有空沒空都會過去那裡坐坐，討論一些事或發洩不滿。像是錠子的事情、夫妻兩個人想要同一班；有時候是制度上的問題：女生薪水上會比較少，主管級都是男生；或是契約工的問題：我進來遠化時不是契約工，但像林湘員¹²就是，她很感謝羅美文的幫忙。我們夫妻應該都有這樣幫助工人的觀念跟感覺，畢竟在同一個工作現場，這些東西我們都很熟絡。

契約工不知道是跟學歷有關還是怎麼樣。跟我同班的有些人是契約工，勞動條件就不太一樣，主要差別是薪水、年資。契約工主要是女性比較多，她們跟羅美文提起這個事情，他覺得很不公，就在工會提出來。因為在絲廠，這一群女生跟羅美文也接觸最多。工會裡頭，常務監事羅春燕雖然也是在假撚廠的女性，可是她做的是文書工作，我們也比較不會討論女性的議題。工會之

12 林湘員，1958年出生於新竹新埔。1973年國中畢業後，至台元紡織服務7年，再於1980年轉至遠東化纖服務。在遠化服務期間，曾因契約工生產津貼的議題，與公司進行調解，透過工會的力量，此一議題最終解決，成果擴及全廠的契約工。

所以關心契約工，還是因為羅主席（按：指羅美文）在絲廠跟她們有比較多的互動。工會對這件事情的主導權，大部分還是羅美文很積極爭取的，不是勞支會（按：勞工運動支援會）¹³或外面的團體爭取的。

早先進工廠，可能跟人家還不是那麼熟，我就是跟班；後來才開始希望透過什麼方式，能讓大家聚集在一起。我們中班是晚上六點多吃便當，晚上十二點下班，遠化附近有好幾家小吃店，我就會找大家去吃個點心，新埔板條不是很有名嗎？我們就會揪一揪，大家去吃板條。吃飯的時間不會很長，如果時間晚了，大家就會回家睡覺。因為天天要相處，所以我還是會想要合群一點。我有很多事會用這個方式找大家來，但是我又很龜毛（ku-moo），真正覺得處得不好，或是覺得他不行的人，我也不會非常想要揪他。

假撚廠的工作可能比較辛苦，這也是我們比較團結的關鍵之一，「比較辛苦」是指跟其他現場單位或文書、檢驗科的女孩子相比。但就算辛苦，相處起來反而蠻和樂的，這比較重要。我們假撚廠的女孩子互相在一起打鬧，感情比較好；可能平常比較辛苦，她們也比較能夠理解，假設我們要爭取什麼勞動權益，她們自發的、理解的程度，都會比較ok。

這些事情不能說跟後來假撚廠女工的團結沒有關係，但是關聯性應該不是至關重要。我覺得羅主席還是最重要的因素，他對於他認為對的事情非常、非常執著，執著到我覺得怎麼會有這樣

13 關於勞工運動支援會、勞動人權協會等組織介紹，請見亞洲專訊中心、何雪影。1992。《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》。台北：唐山出版（鄭村棋、舒詩偉、何燕堂、王芳萍、高清崧譯）。

的一個人。他就像傳教士一樣到處去，而且藏不住話，像透明魚缸裡頭的金魚。他完全沒有秘密，也不會分好人或壞人，就是這樣透明得讓人家對他很信任，他的做事風格就是什麼都講，完全透明化，很樂於助人。

我們絲廠落絲時，有廢絲產生，所以有廢絲袋掛在角落，我們夜班會偷偷躲在廢絲堆裡頭睡覺。廢絲暖暖的，冬天睡在那裡還是不錯的。如果羅美文在那邊，就連女生也敢跳進去睡，她們不會覺得羅美文有非份之想，這件事就讓我感覺到別人對他的信任。羅美文最沒有什麼身段，也沒有階級的姿態，別人有什麼事，要他幫忙就幫忙，算是非常平易近人，也得到很多人對他的信任。這其實也要被幫忙的人是本身也很有良心的人，否則以現在功利主義的社會，像他這樣很容易被人家出賣、或被當成傻子。或是說，反正你就是這樣的個性，我也不覺得我欠你很大的人情。現在大家都很自我、很現實，他這樣的，我覺得算很吃虧吧。

五、當工廠的生產碰上家庭的生產¹⁴

剛去遠化的時候，大家幾乎都還沒結婚，我是在70年（1981）結婚。羅主席說他的同學、朋友一個個不見了，其實是

因為結婚才比較少出現。71、2年（1982、1983）之後，結婚的比例越來越高，但因為在遠化的多半都是當地人，就算結婚，大家都還是會出來工作。

遠化在當地的名氣很好，你要有關係才能進去。遠化的福利待遇也算是很好，62年（1973）左右，羅主席說他印章要隨時帶著，會有這個獎金、那個獎金，隨時要領錢。我去的時候越來越沒那麼好，再後來到工會很強的時候，那時候也很棒。遠化的勞工流動率很低，這是很特別的。我這個年紀的員工，有些人現在退休或還沒退休，還會引進自己的第二代進去，流動率也不高，好像家族企業一樣。

以前的女工，大家經濟狀況都差不多，而且全部都未婚。遠東沒有禁孕條款，但大家都是上班到要生產前才會請產假。第一年進去公司就有特休假七天，我都拿去換錢。在這裡上班，我很執著地認為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深怕工作不留人，所以特休假都會捨不得休。後來懷孕期間嚴重不舒服，可能體質的關係，工作當中會暈，我就會立刻請特休假，回宿舍休息。休息之後有比較好一點，再進去上班。那時候請假可以半小時、一小時這樣請，我的特休假是這樣用完的。早期人事單位在休假方面沒有管這麼緊，應該是因為人力比較足一點，所以特休可以請半小時，後來改成一小時為一個單位了。

那個年代在我們鄉下拜拜，前一天就要備菜，準備第二天請客。因為懷孕，我特別怕油味的，聞到就會吐，可是也沒辦法，當媳婦就是要做這一些事情。有時候很不舒服就進房間一下，聽到婆婆的腳步聲，又趕快出來，那時候真的是吐到沒東西吐，甚至吐出綠色的酸汁。懷孕就是會非常沒胃口，也會非常反胃，

14 本段標題借用自新竹縣產業總工會女工合唱團的一篇文章。見119。2008。〈當工廠的生產碰上家庭的生產...〉。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（[url=http://www.workersthebig.net/home/women-workers-chorus/reading-note/119/article33](http://www.workersthebig.net/home/women-workers-chorus/reading-note/119/article33)），檢閱時間：2021/03/09。

會很獨特地想吃某一種東西，或者是特別要重口味的東西來壓過我們的胃，假設沒有吃到的話，就會流出淡淡的口水，相當不舒服，也會更想吐。

我懷兩胎的時候都摔過車。老大的時候，有天自己騎摩托車上班，在途中的轉彎處，爲了閃避對向來車，摔到田底下去了，那時候肚子很大，請了兩天假，全身還酸痛就又繼續上班，可是嬰兒沒事，可能注定要跟我們吧。第二胎是羅美文騎摩托車載我去上班，在等紅綠燈要走山路去工廠，在轉彎時輾過坑洞摔車，老二那時候才四個月，可能更容易流產的，卻也沒有。

以前一樣有 56 天的產假，大家幾乎都是要生孩子了才請，不像現在有些產婦是提早預產期的之前就請，更不是懷孕幾個月之後就待產。結婚、懷孕然後要生孩子，那也是必須的，那時候可能對於女性的法律還不是規定得那麼嚴謹，懷孕幾乎要等到孩子要出來才去醫院，沒有像現在提前幾個月就調成常日班，我們也很不好去要求，怕會沒有工作，或者說工作被別人頂替了，所以就會很掙扎，一般女性都是比較能夠忍受。

第一胎到破水了，感覺褲子溼溼的，覺得不行了，我才請假。羅主席就騎摩托車載我到新竹他姊姊家洗澡。洗澡之後送到婦產科去待產，醫生問開幾指了，就叫我走樓梯；一下子後，又說差不多快要生了，羅美文就回家拿臉盆、盥洗用具。他回到醫院的時候，第一胎已經出生了。生第二胎的孕期後段我就沒輪班了，五點下班回來，覺得肚子不舒服，好像很快就要生了，還是把雞餵好、豬餵好，主席才帶我搭公車到新竹省立醫院的婦產科去生。

懷孕的女性員工沒有被逼退的，但是考績一定會打乙等。你

請了產假得變相扣薪，這是公開、大家心照不宣的事。我是 71 年（1982）四月有第一個孩子，第二胎是 72 年（1983）四月，也遭遇過這個狀況：考績乙等，什麼也輪不到，調薪可能沒辦法調、績優人員不會輪到你、模範勞工也不會提到你，長久以來沒有比較強大的力量抗議，反映也沒有用，只是會覺得這樣是不合理的。

剛進公司的時候，製衣廠就在化纖廠旁邊。不過，製衣廠歸製衣廠、化纖廠歸化纖廠，兩邊獨立，完全不相關。罷工的時候，羅美文當然也有號召人來聲援，他也有幫助製衣廠，她們工會是以黃秋月爲領導。我會認識製衣廠，是在罷工之後我擔任新竹縣總工會的理事，靠這個機會去輔導了一個一個工會，遠東製衣工會就是我輔導的。

我後來跟製衣廠的黃秋月接觸，他們工會只有一位男性工會幹部徐元昌。製衣廠沒有了之後，徐元昌成了勞動黨黨員。那時，製衣工會所有重要的職位，女生都推給男性，我想說，「幹嘛，主管都是男性，工會幹部大多是女性，工會最高級別的也要給男性？很多女性的事情，他並不知道啊！」比如說我們提出來的生理假，他也不會這麼清楚，我就說，「爲什麼什麼都要是男性，你們工會所有人都是女性，爲什麼這一定要給男性做呢？」

剛進去的時候，結婚的人少，住宿的人比較多，後來一個一個結婚，宿舍的人越來越少，我結婚之後也不住了。我跟羅美文原來都是同一個班，所以可以從湖口到新埔一起上下班；後來他調成常日班，我還在輪班，沒有辦法從湖口去，我們就一起在新埔租屋住了 7 年。那時老大跟我到新埔去住，老二在湖口讓婆婆帶了一陣子。

羅美文搞工會搞得特別狂熱的時候，常常很晚回家。我常常想，「我要上夜班喔，他怎麼還沒回來，孩子要怎麼辦呢？我到底要去上班，還是顧小孩？」心裡難受到不行，超級煎熬。羅美文還曾搞丟孩子，有一次假日我上班，他帶老大參加活動，散場就走了，完全沒想到他帶孩子出去。罷工的場合，我們也會帶孩子去發文宣。要是有人不拿文宣，小孩還會跟其他人說，「爲什麼你們不要拿文宣呢？」

六、罷工裡的女性身影¹⁵

工會自主化後，改變非常大。公司要動一個員工或某個制度，他就要想到工會會有什麼舉動。那時候工會比較強大，羅美文又因爲工作的關係，可以遊走多個單位。像是交通車的問題，當時都是羅美文聯絡遊覽公司調車，都是工會在幫忙。那家遊覽公司對羅美文非常感謝，可能因爲遊覽車業也剛起步，很多工廠都會請來當交通車。遠化是一個大廠，比如說有關西線、竹東線，上下班都發車，沿途停哪些點都有明確規定。工會每個月都會做統計，錢是多少錢、會有多少人搭，用這個來決定要不要開發新的線路。

77年(1988)的2月10號，工會怠工爭取年終獎金公式化，羅美文很賣力，有「一人工會」的感覺，他把怠工當非常重

要的一回事在做。這場怠工是有部署的，是因爲公司已經先片面確定年終獎金的金額，他們下班會在新埔勞工服務中心討論，中心是借用陳金進的場地開會的，我會去旁聽但沒有參與討論。

我很早就參與勞工服務中心了，特別印象深刻的是罷工前在新埔勞工服務中心進行的討論。很早之前，我就會跟羅美文騎著摩托車去聽黨外的演講，或比如說新光紡織的抗爭，我們都有去參與，所以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。羅美文沒有叫我去參與，但是我本身也會關心這些事情，勞服中心也離當時新埔的家裡不遠，所以經常會出席。

2月10日怠工，工會當天號召：今天上班時間八點，大家就坐在中央走廊，工會拿著麥克風在講。那時夜班的下班，早班的上班，大家就圍在那邊，除了工會幹部之外，很少人靠在靜坐的組織裡面。看一看，假撚廠最多人站在那裡，但沒有人有動靜，沒有人號召。雖然不是工會幹部，但也很多人知道我是羅美文的老婆，大家都不敢當第一個，不敢說工會叫我們就怎麼樣。這好比賣東西，你是銷售者，你自己講一百遍，不如使用者講一遍那麼有效。我看看覺得工會說得對，不是完全是因爲羅美文我就支持，我覺得是沒有人敢做第一個，當然要我帶頭。我就叫大家過來聽工會怎麼說，後來大家就全部圍在一起了。羅美文對這件事印象很深，他說，「秋香很厲害，都是她號召叫他們來，大家就通通過來了，開始形成了集結。」

再來就是當年的10月25號，那天剛好新埔作平安戲的拜拜，哪一家同事輪到拜拜，我們大家都會騎摩托車去吃拜拜，有些吃完回來就再上夜班。我們也不只去一家，假設現在新埔的同事哪幾家今天輪到，沒輪到的人全部都會騎摩托車去他家吃一

15 關於本節討論遠東化織罷工的過程，請參考趙剛。1996。〈工運與民主—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〉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，24，頁1-39。

吃，又再去第二家、第三家……一家一家吃，再去上大夜班。以前是農業社會，平安戲要大請客，年代一直演變，現在請客的人越來越少，有拜但沒在請客了；演變到後來不拜三牲，就拜水果；再演變，我要上班，沒辦法拜，前一個禮拜有空去拜，到現在年輕人根本就不拜了。

工會算準怠工剛好是新埔平安戲，取那一天作為事件要發展的那天。因為工廠裡「官」的年終獎金比較多、「兵」的比較少，要是以薪資比例計算年終獎金，又會繼續是官領得多、兵領得少。工會認為這樣不行，提出要以人頭計算，每人加發 9,000 塊。怠工碰上平安戲，大家樂得輕鬆，全部都去給新埔的同事請客，所以得到徹底的成功，資方立刻求饒。羅主席很敢下決定，他鐵了心請人來搭篷帳，就在行政大樓的前面，本來覺得要長期抗戰，但沒有想到這麼快就結束了。我覺得怠工要有時機，讓人家明白地理解；第二點是你要下判斷、做準備，不要隨時想要弄，時機不對的話，人家不會理解，也不敢跟進。

隔年 5 月的罷工，我們在 5 月 8 號投票。罷工投票完，1278 張贊成票對 59 張反對票、廢票 11 張。看到結果我很高興，差距這麼顯著，可以名正言順罷工，我們可以去帶動、去說我們有道理。雖然投票出來的結果很好看，可是跟進的人不如我們預期，之後的勞資爭議裡，參與的人數要打很多折。

對於勞支會這些當時介入罷工的外力，我第一個覺得非常高興，有人來關心勞工。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想法或由來，或是說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東西。他們就是很能夠講的知識份子，這對我們勞工來說，會覺得有點畏懼。勞支會開會時，多半都是男生當主角，我個人對這個現象也有點意見，但是那些會議是比較活躍

的人或接觸比較多的人，他們才比較懂，雖然他們有來過新埔的勞工服務中心開會，我也有去旁聽，但是理解沒那麼深，所以也插不了嘴。

新竹縣議會的動土典禮我們也去陳情，當時張鳳和、老汪（按：指汪立峽）、¹⁶ 黃文淵¹⁷ 這些人都跳上桌子，我那天人也在。在鄉下習俗來講，開張吉時典禮算是喜事，我會想，「這樣子會不會造成人家反感？」但既然工會這樣下決定，我們就是拉著布條、走在前面，喊著進去。官員在拜，鬧場的人也在拜，黃文淵還打著大豬公說，「天公愛我，我愛遠化，遠化不愛我」，之後我們又轉到縣政府去。當時我負責帶動，要想怎麼讓這些一起去的成員能夠聽工會的話，就像跳舞的舞蹈老師，我會站在大家前面帶頭喊。

大家可能會想，「妳做這些，都是因為妳老公在做，所以妳完全就聽老公的。」不瞞你說，我可能有一點點這樣的心態，但真的只是一點點，不完全是這樣。我覺得自己的意識、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，羅美文說得對的就去做，他錯的我會狗血淋頭地罵、他不好的我一樣會講，不會隱瞞起來。對他來講我這樣做應該是好的，他才會有反省能力。

16 汪立峽，1944 年出生於重慶，為 1980 年代重要的工運參與者。請參考汪立峽口述，林麗雲、陳筱茵、蘇淑芬、陳瑞樺、郭佳訪談。2017。〈往事並不如煙：汪立峽訪談〉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，108，頁 183-205。

17 黃文淵，1954 年出生於新竹芎林。1969 年初中畢業後，赴台北就讀莊敬中學電子科建教合作班，期間於通用電子服務，並擔任通用電子工會會員代表，高中畢業後短暫離職又再返回通用公司。1977 年退伍後返鄉覓職，1981 年進入亞洲水泥橫山廠工作，1985 年擔任工會理事，並於 1989 年遭公司解雇。

罷工時，有些假撚廠的同事也會主動幫忙分擔工作，比如說蔡瑞鳳、劉金枝。大部分會這樣的人，罷工的時候成爲了種子，是主要的要角。她們未必能像我這樣召集人，但光是主動參與，這就很了不得了。她們目前還在遠化，雖然平時很少聯絡，但對現在各方面的局勢，觀點還是跟我一樣。例如現在 ECFA 要停了，各廠的工作量非常緊張，做得很操勞；但工會根本就是闖雞工會，一年帶大家去勞動教育一次，實際上去玩的居多。她們居然說，「我從來不去，有些人只要給它這樣子帶去旅行，就對工會沒太多怨言。」她自己就非常有怨言。可能因爲輪班，又對大局勢有種「就是這樣」的無奈感吧，無能爲力去扳回，她就自己過自己的。

罷工時的男女分工，就跟我們平常去誰家聚餐一樣：男女沒有刻意去分要做什么，但好像是社會的影響，就變成這樣子。像我在新竹縣總工會擔任工會幹部二十幾年，工會辦活動，有的人指揮交通，有的就是出席但實際上沒做什么，但女孩子卻什麼都要做。工會罷工的時候，男生就做特定工作如搬重物、女生就做什么，但像是財務就很主動地變成女生的工作。

羅主席被解僱的時候，我很恐慌。他身爲一個領導者，就算被解僱，也要撐到最後，不能棄守崗位。不然要是一被解僱就萎縮了，其他人怎麼辦？在這之前，我們沒設想過他會被解僱。又好比看到他跳進工廠被打時，身爲他太太，我也感覺到很恐慌。但是再怎麼恐慌，還是要撐下去。那種煎熬，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。罷工時我在絲物理檢驗室，屬於比較輕鬆的單位，但我出去也不是，不出去也不是。我其實都在罷工現場，主管卻告訴其他女工，「妳看，羅美文他老婆也沒有在罷工現場那邊，妳們不

要去參加罷工」，沒有出去參與罷工的人，當然也不會知道我在罷工現場啊。

罷工期間推鐵門的時候，羅美文身陷裡面，我們看不見人，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？後來他就被扶出來了。我覺得有點厲害的是，他一聽說裡面的假撚廠女工被關，就說要跳進去。有幾個可信的工會代表，好像有去義民廟發過誓，發誓說要堅持到底、不背叛大家，我們的籌劃不能事先洩漏出去，他們當時很堅定，這就是神的信仰。但當時還是有些工會理監事或要角，會把這些資訊漏出去，有些人就想從這裡得到好處。

罷工當時，廠外還有許多花圈，這是因爲羅美文當時是勞動黨首任的黨主席。另一方面，官方多半偏向資方的行動，這是肯定的。我甚至覺得國家機器有在跟資本家合作，就要破壞、打壓這個工會。在罷工的晚上，官方派了很多警力來，甚至連噴水車也來了，很多強固保全的保全員，都聽資方指揮，隨時堵住想要衝進來的人。

七、罷工後的復原與再出發

罷工結束後我還被保全跟了半年，他們駐紮在工廠裡面，我就像瘟疫一樣，沒有人敢跟我講話。原來那時候大家不跟我說話有兩個原因：第一個，本來上面就不喜歡我，要是跟我講話，他今年的考績不就完了嗎？第二個，罷工過了至少一年後，我同事才明白跟我講，「不瞞你說，課長要我們監視你跟誰接觸，你在單位跟誰講話了，你的一舉一動，我們都要寫日記回報。」當時

我完全不知道資方有叫人做紀錄。

我那時非常痛苦，沒人敢跟我講話，也經常給資方找去問話。資方希望我能夠軟化，不要那麼堅持、那麼硬，現在工廠有愛廠季獎金，就算是不吃檳榔、做做晨操，你只要來參加也可以領到那些獎金。事後來看，那是罷工過後要安撫人心的蜜月期，持續蠻久的時間。愛廠季獎金本來是按月給的，蜜月期淡了，資方又調成按季發給；再後來，有同事在退休時，為這筆獎金是不是屬於經常性給與，要不要算進退休金，跟公司做勞資爭議調解，在羅主席幫助下，順利拿到這筆獎金。公司擔心此例一開，愛廠季獎金會成為固定的薪資，乾脆就不給了，讓你以後不得有爭議。

總之那時候我在那單位非常痛苦，有人跟蹤就算了，上班到下班除了同事之外沒人跟你講話，同事裡還有人在監督我。一段時間後，太痛苦了，我想辭職，但後來不知道什麼動念，我想：他那麼討厭我，我留下來，他們如坐針氈，不是變成我更爽？這個動念讓我改變，我就不辭，繼續幹下去。

在羅美文的時代，我不是理監事，只是一個代表。罷工失敗後，工會搬到小木屋餐廳去，改選時勞方勝選了十席，資方有兩席。資方那邊，一個是原本的常務理事、另外新進來一個能言善道的。工會在罷工之後就消退了，雖然勞方還有十席，後來漸漸、漸漸被資方軟硬兼施弄掉，罷工很積極的參與份子，那時被也逼退了非常多人。像莊錦清，他的文筆比較厲害，也比較敢講，後來留下來當常務理事，資方把他升任，名義上是廠長助理，也不用做事，其實是要讓他與其他人隔離，這就是軟禁的一種。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被軟禁，還有很多人都被這樣子對待，大

家受不了，勞方就越來越萎縮，再來下一屆、再來下一屆，我們勞方人就越來越少。

罷工失敗後最近一次的改選裡頭，羅美文還是有主導勞方運作。送出去的理監事名單裡頭，我們在十二個理監事裡拿了十席。為了繼續運作，我們就在遠化旁邊成立了「勁草社」¹⁸基本上就是由夏林清跟鄭村棋來輔導，希望我們工會能夠維持比較久。

勞方理監事請會務假時，待遇完全不一樣。比如說我們的會員直系親屬往生，工會會派代表去撿香，但站在勞方這邊的人，撿完香就要立刻回去，否則被逮到的話，公司就一定可以扣你帽子；但是資方的人就是儘量讓他出去，一整天都可以不用回來。我們客家話講一句，就是他們去送行，還可以幫忙做風水。還有別的例子：到更後期，工廠要我們優惠退休。我們物理室單位另一個同事因為怕被迫退休，所以參與工會選舉。選上之後，我跟他的待遇完全不一樣，比如說我在物理室編制有 15 個人，我要算一個人頭，可是她都不算在編制內。早上去工會，下午可以隨便請假，回來工作時他高興幫誰做事就幫誰做事，所以當然受大

18 根據夏林清、鄭村棋的說法，遠化罷工時，鄭為遠化工會顧問；夏雖未參與罷工歷程，但亦在現場觀察。1989年5月罷工失敗後，「自始至終積極參與罷工的一小群工人仍凝聚在工會中」，他們因為罷工遭受的挫敗和打壓而感到憤怒與絕望，夏、鄭便在此時決定「協助這一小群工人面對他們的挫敗而能再度站起來」，並在同年的6月初至8月底固定地與工人們「討論反省他們的經驗」。見夏林清、鄭村棋。1992。〈站上罷工第一線——由行動主體的角度看一九八九年遠化五月罷工抗爭的發生與影響〉。收錄於夏林清，《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——有關台灣勞工生活的調查報告（1987-1992）》。台北：張老師出版社，頁241-288。

家歡迎，我就不一樣。

關於移工議題，我曾經在工會提出來。遠化都是用菲律賓的移工，他們跟本勞分開，有特別的一間宿舍，又有特別的人去做移工管理，他們都沒有加入我們工會。我因為參加外面活動，希望移工也能夠加入工會，當然這個是被否決了。大家覺得這些人畢竟是外籍勞工，所以不讓他們參與。我覺得語言不通應該不是最主要的原因，認為「他們是來搶工作」的想法可能影響比較大。資方大概也不會同意讓他們參與，為什麼我知道資方不會同意？因為資方的工會幹部的說詞，我就覺得是這樣，當然我們也想像得到。

我進入工會的時候，12個工會幹部裡頭，女性非常少。況且女性本來就不太敢發言，要提出意見也是比較扭扭捏捏。但男生不會重視這一方面，我對這件事當然很有意見。開會的時候，不要說主導權，女性連講話的聲量也比較小，參加工會幹部選舉的也很少；即使女孩子進入，懂與不懂暫時不論，就算提出議題，也大多被否決，工會還是由男性主導。

罷工之後，我先是參與台灣省人造纖維業工會聯合會，後來覺得會址太遠了，想要就地做事，所以換到新竹縣總工會參選。我沒有跟其他人連線，單打獨鬥卻勝選了，才開始被分配到各工會做輔導。後來我當然有投入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的成立，其實是從我們家的客廳開始。當時其他縣市的產業總工會成立，新竹縣也希望能有一個自主的工會，因為我清楚新竹縣總工會是闖雞工會，又剛好輔導過了不少工會，就在我們家跟其他人和在一起。大家多半在下班時間都比較能夠投入，雖然不是很嚴肅，可是從這樣的聯誼開始，最後才一直演變，然後才正式成立了竹縣產總

（訪談者按：即新竹縣產業總工會）。

對我一個工人來說，輔導工會沒有那麼多流程。但我是覺得：既然當了工會幹部，不要只是去跟他們和和交情。產業總工會的確是比較自主的工會，他們勞教就是有上勞教，出來的幹部素質真的是不一樣，外界的交流、NGO組織有什麼樣勞工的議題，產業總工會也會去參與、去關心。縣總工會一般出去輔導，講一些客套話就完了，我覺得這個就沒有意義，我希望能夠從頭到尾投入。我輔導的工會要是開會，我也都有參與，除了跟他們建立更深厚的感情之外，也讓大家理解外面的勞工議題，不要像之前的新竹縣總工會，只是關心下屬工會的議題。

參與工會的工作，其實沒有特別什麼對個人的好處，但我還是覺得很慶幸。能夠因此認識比較多人，也認識了比較多的事物。女性參與勞工運動特別辛苦，自己家裡也要顧，外面這些也要去理解。跟人相處也是一個比較難的學問，難處就是要花很多時間、精神跟體力。不過，我學會了該怎麼樣去分辨對錯，對於自己要花更多心思在這方面，也沒有後悔。我經常覺得大家都想上天堂、撿現成的好處，誰都不想下「地獄」、沒有人願意做苦幹實幹的基層工作。但我們不下「地獄」，大家都要上天堂，那誰才下「地獄」呢？